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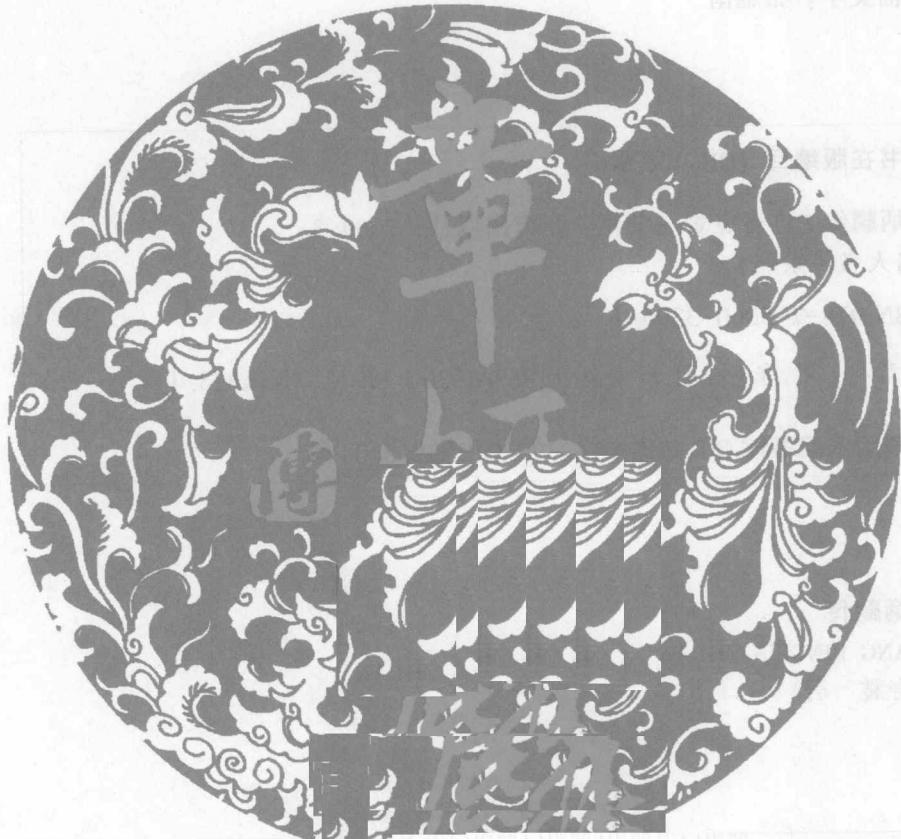
许寿裳 著

许寿裳是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与传记作家。
《章炳麟传》是现代中国第一部章太炎评传。

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之门，大诟袁世凯之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无第二人；与孙中山同谋革命，其于缔造民国之功，孙中山之外，并世无第二人；学术之大，前无古人。于考据训诂，从小学入手，以朴学为基，以玄学致广大。对古今东西学问，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清代三百年学术中，并世无第二人。



東方出版社



東方出版社

总策划：王德树
责任编辑：张芬
特约编辑：若鱼
封面设计：阳洪燕
封面文字：张耀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章炳麟传 / 许寿裳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3
(名人名传系列)

ISBN 978-7-5060-3396-1

I . 章… II . 许… III . 章太炎 (1869~1936) - 传记 IV . K82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3404 号

章炳麟传

ZHANG BINGLIN ZHUAN

许寿裳 著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6

邮购电话：(010) 65250042 65258589

印 刷：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版 次：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30 毫米 × 970 毫米 1/16

字 数：214 千字 印张：16.75 彩插：4 页

书 号：ISBN 978-7-5060-3396-1

定 价：38.00 元

章炳麟先生年轻时留学日本的照片



章炳麟书法

先生之书法自成一家，名气很大，人们以得到其片纸只字为荣，视若拱璧，代为珍藏，倒是他本人对自己的作品总为不满，常当作废纸抛弃。

俗說西北來置我細鐵咸開
誠風濤涌中有掉尾鯨蓬蛇
羅小族頃細不逞名安天立軍
傳承不終宴榮空垂犧獻走
高枕形神清劍客除重言顧
我非公卿留之憐不詳祚之混
柴荆服飾定尊卑大卦定古
往今我一職老莊得更量營糧
煌珠官物復盡褐斤鼎歎其
秀君子干戈尚縱橫幸振方權
揚未馬自肥輕李鼎瓦陽
實以驕青丘來填賜自盡業
豪直沮兵皆聞黃金委空見憇
名生榮何曰舍猶受此辱耽情
錦絲卷還賓始覺心和卒振我
粗序差愧空妄慕羨

音工部玉宇。首以應

庚午夏章

劉自爾向別釋
義之羣臣謹啓
新即樂同勿簡
經紀

容易兄鑒
章炳麟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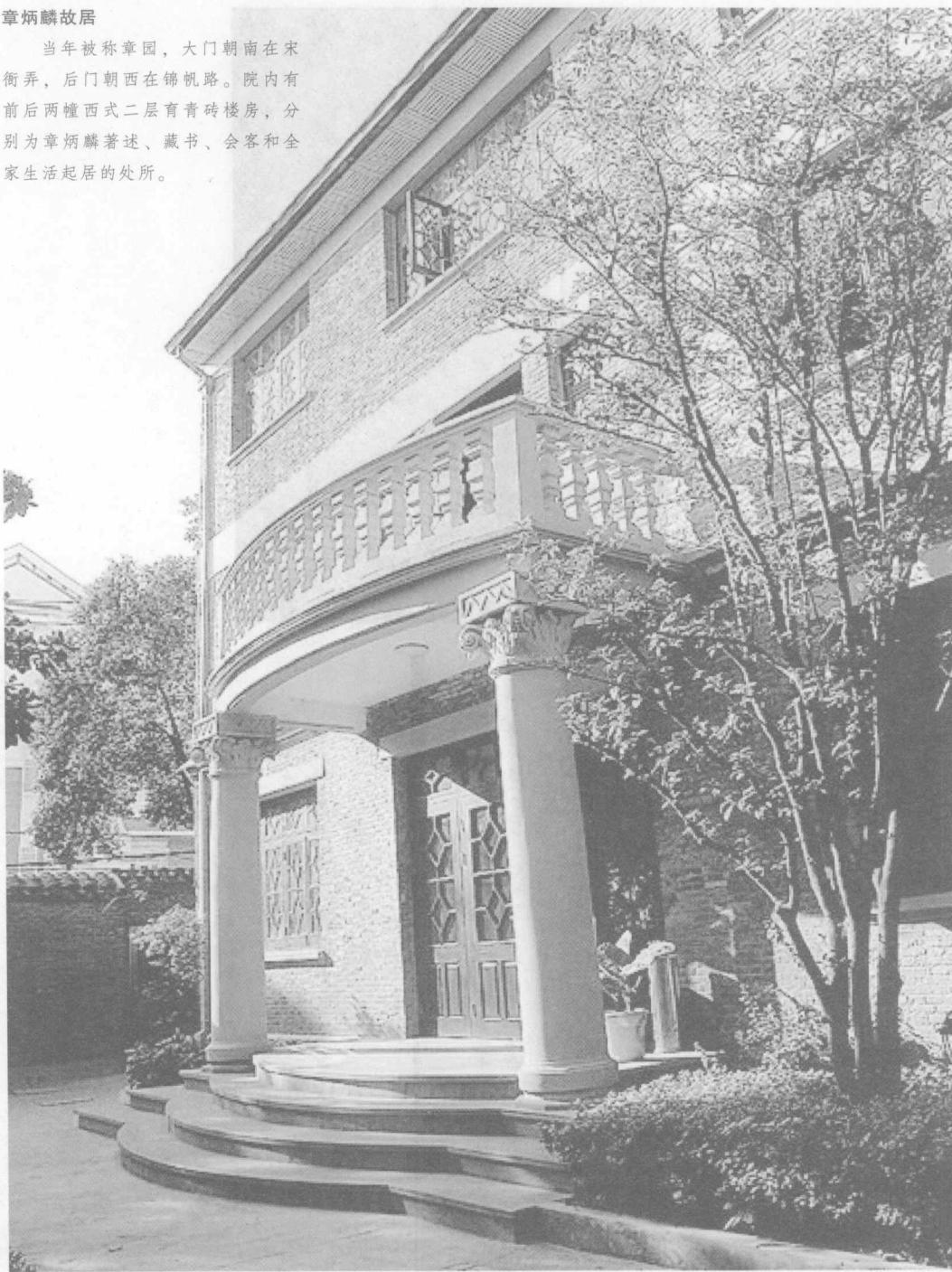
章炳麟篆书绎山碑

章炳麟先生晚年照



章炳麟故居

当年被称章园，大门朝南在宋衡弄，后门朝西在锦帆路。院内有前后两幢西式二层育青砖楼房，分别为章炳麟著述、藏书、会客和全家生活起居的处所。



尤書原刻手寫底本

章炳麟手写底稿

國朝

尤書目錄

- 尊荀第一 儒墨第二 儒道第三 儒法第四 儒俠第五
儒兵第六 公言上第七 公言中第八 公言下第九 天論第
十 原人第十一 民數第十二 原變第十三 冥契第十四
封禪第十五 河圖第十六 輢疊第十七 訂寶知第十八
平等難第十九 族制第二十 喻侈靡第二十一 訂文第
二十二 明羣第二十三 明獨第二十四 擣種第二十五 東
方盛衰第二十六 蒙古盛衰第二十七 東壁生第二十八 客
帝第二十九 宣統第三十 分鎮第三十一 宅南第三十二
不加賦難第三十三 戰盟第三十四 商鞅第三十五

正萬第三十六 刑官第三十七 定律第三十八 改學第三
十九 弁兵難第四十 經武第41爭教第四十二 夏教第
四十三 明農第44 制幣第45 禁煙草第46
鬻廟第47 祸說第四十八 獨聖上第四十九 獨聖下
第五十
幼慕獨行 牛丁患難善行 却曲廢不中權述鞠迫言庶自完于
皇漢
辛酉後書三百三十
光緒二十四年夏七月十二月章炳麟識

整理说明

一、《民国学术经典》丛书旨在网罗民国时期的学术精品，为读者了解和研究民国时期的文化学术成果提供经过校勘整理的读本。

二、丛书编选范围原则上起自 1911 年民国建立，迄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所选诸书均为大师名家之作，亦择其精善之版本。丛书下又分若干系列，如西洋史系列、中国史系列、名人名传系列、断代史系列、名人回忆录系列、名人文集系列等，以期对民国时期的学术成果作一全景式呈现。是编为名人名传系列。

三、本系列为“名人名传系列”，披沙拣金，精中选精，凡十人十二种。

吾国传记文学源远流长，文史并重。司马迁之《史记》即代表传记文学古典的黄金时代。民国时期，经梁启超与胡适的极力提倡与努力实践，传记文学名家辈出，佳作纷呈。

本系列所收诸书原版均为繁体文本，在其流布过程中，难免出现版本差异、文字错讹等现象，为方便读者，故做如下整理工作：

(一) 整理者对著者爵里、版本流布、各界评论均有说明，以期为读者提供阅读指南。

(二) 所选著作，以其原始版本为底本，尽量搜求不同版本，分别校勘，择善而从。

(三) 校勘中，只校是非，不校异同。凡底本脱衍讹倒而他本不误者，据他本勘正，并出校记。

(四) 凡笔画小讹，不见字书，显系误刻者，一律径改，不出校记；凡日目淆乱，己巳巳混同，戊戌戌不分之类，一律径改，不出校记。

(五) 一般不用理校方法径改原文。确有把握且非改不可者，改后出校记说明。

(六) 繁体字改为通行的简体字，但容易引起误解的人名、地名用字，仍保持原貌；习见的异体字、通假字，原则上保持原貌。

(七) 标点符号的用法，多从作者习惯，除个别明显排印有误之外，均未予改动。

(八) 本系列所收梁启超之《王安石传》、《李鸿章传》两书，虽出版于1911年之前，但其为“现代传记文学”之源始，地位特殊，故亦酌情收入。

著作既著录生平事迹，亦有褒贬评议。因时过境迁，有些观点囿于历史局限，望读者甄别。文中插图，其意有三：或与文互补，或交代背景，或补充延伸，旨在辅助读者之深层阅读。

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我们虽勉力为之，而乖漏难免，祈方家教正。



代序 有思想的学问家 ——关于章太炎

陈平原

身兼斗士与学者的章太炎（1869—1936），一生屡遭世变，多次卷入政治斗争旋涡，可依然著述、讲学不辍。早年奔走革命，不忘提倡学术；晚年阐扬国故，可也呼吁抗日。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徘徊，是清末民初学者的共同特征；章太炎的好处是干什么像什么，是个大政治家，也是个大学者。后世学人关于民国以后的章太炎是否“退居于宁静”的争论，未免过分集中关注其政治生涯。换一个观察角度，由从政转为问学，很难简单认为“颓唐”或“消极”。在我看来，章太炎不只是革命家，更是近代中国最博学、思想最复杂高深的人物。鲁迅称章氏为“有学问的革命家”，我则倾向于将其作为“有思想的学问家”来考察。

谈论章太炎的思想与学术，很难不作分期把握，因其思想庞杂且变化多端，根本无法“一言以蔽之”。前人关于章氏思想发展的分段，

颇多可议之处。关键不在分段时提前几年抑或推后几年，而在使用的理论尺度以及无意中表露出来的论者的学术思想。

最常见的弊病是过分依赖历史事件，而不大考虑对象自身的特性。甲午战争、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当然会在章氏生活和思想上留下烙印，可将其作为分段依据则嫌牵强。外在的政治事件与个体的生命体验和思想学术追求不能画等号，尤其是像章太炎这样有极强烈的独立意识的思想家，根本不会随时势流转。将个体感受直接依附于外界发生的政治事件，说成是其“必然的反映”，而不尊重个体独特的生存处境、感情世界以及内在思路，所有历史人物的思想发展也就只能一刀切了。

与此相关的是，过分突出所谓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斗争（或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分裂），用外在的政治行动作为评价的唯一依据，抹煞章太炎思想的深刻性与复杂性，使得历史人物一下子平面化了。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上下求索，许多见解既空泛又深刻，一时难断是非曲直。只因为辛亥革命成功，就断言“革命”是好“立宪”是坏，未免过于草率。史学家吕思勉曾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君主和民主比较，自然君主较旧而民主较新；可将革命和立宪比较，“革命是吾家旧物，而立宪的观念则来自西洋”（或者说革命是旧而立宪是新）。主君主立宪的康、梁与主民主革命的孙、章，都不是“新旧一中西”（更不要说“进步—落后”）这样简单的模式所能概括的。

章太炎自述思想变迁，有一句话很精辟：“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薊汉微言》）这话常被研究者引用，可具体阐释五花八门，尤其是关于“真”、“俗”的界定。比如，随顺众生为俗，破除迷妄为真；具体事物为俗，抽象哲理为真；史学为俗，哲理为真；学以致用为俗，实事求是为真；儒学是俗，佛学是真；经验现象是俗，心灵本体为真……等等。章氏既持真俗之辨，又主“真妄同源”，颇多精彩之论。不过，倘以这假定性的“真俗”说衡量章氏一生，其“转俗成真”与“回真向俗”恰好落实在两次系狱。“遭世



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此乃未经“真”洗涤的“俗”；“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覲，专修慈氏世亲之书……解此以还，乃达大乘深趣”——此即“转俗成真”；“癸甲之际，厄于龙泉，始玩爻象，重籀《论语》”——此乃“回真向俗”。三年系狱，三年幽禁，前后两次被囚，精神状态大不一样，可都促使章氏深思熟虑，重新反省其政治理想及学术追求，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思想转变。这种转变当然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和《太炎先生自述学术次第》对此也含糊其辞；为了论说方便，只能作如下大致划分：第一次转变以1906年出狱东渡日本为界；第二次转变以1915年幽禁中作《蔚汉微言》自述“回真向俗”为标志。以此二变三段来把握章太炎的思想变迁，相对强调内在思路而不是外在行动，价值追求而不是政治倾向。

二

谈论章太炎的学术思想不容易，因其糅合百家而又自成宗派，思想资料和学术渊源颇为复杂，不同时期所吸收、所推崇的又很不一致。不过，大致而言，章氏学术思想的形成，依其先后可分为古今文之争、中西学之辨和儒道释的调适三个层次。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不是在一种平静状态下接受某一思想（或学术观念），而始终是坚持“依自不依他”的独立意识，在争辩中、对抗中选择取舍，融会贯通的。

章氏治学讲求自得，既反泥古，也反媚外。评判历代学术，其重要标尺就是能否“独立自得”。而对西方学术，章氏从来都是以我为主，不为所拘，有时甚至故显倨傲，言辞刻薄。可另一方面，章太炎其实颇为善于向学术上的对手学习，借助论争激发灵感，完善自家学说。20年代章太炎有一段自白，很能表明他这种治学风格：“我们更

可知学术的进步，是靠着争辩，双方反对愈激烈，收效愈增大。我在日本主《民报》笔政，梁启超主《新民丛报》笔政，双方为国体问题辩论得很激烈，很有声色；后来《新民丛报》停版，我们也就搁笔。”（《国学概论》）

至于为了匡正时论，故作惊人之语，在章太炎也不稀奇。1906年，章太炎写下对新文化运动影响甚大的《诸子学略说》，批评儒家“以富贵利禄为心”，十六年后表示忏悔此“狂妄逆诈之论”，并解释当时立论乃因“深恶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致柳翼谋书》）。这种解释并非无稽之谈，章氏好多轰动一时的惊人之论是服务于其时的政治论争的。李泽厚称其为“半政治半学术的广阔评述”（《章太炎剖析》），不无道理。正因为如此，对其分析评判，不能限于字面所述事实或所依学理，更得考虑其特定语境和潜在的对话者。

章太炎对康有为借公羊学倡改制的良苦用心其实颇有领悟，只是对其论学诡怪恣主观武断始终不以为然。早年为了“以革政挽革命”，章氏曾应邀与康门弟子共事，可“论及学派，辄如冰炭”；只因考虑到其时政治斗争形势，才没有公开批评康氏学说。戊戌政变后，他甚至针对世人对康有为的攻击，挺身而出为其辩护，并自认与康氏“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也”（《康氏复书》识语）。只是到1900年解辫发主排满以后，政治上与康梁等君主立宪分道扬镳，章氏才多次著文痛诋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康有为立说过于武断，弟子梁启超也承认其师“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清代学术概论》）。这种治学方法，与作为古文经学大师的章太炎所标榜的求是精神大相径庭。再加上政见歧异，故章太炎对之热讽冷嘲不遗余力。这么一来，章氏也就难得平心体会康氏立说的长处，“门户之见，时不能免”（同上）。

在今古文之争中，章太炎无疑是站在古文经学一边；而在中西学之辨中，章氏似乎以中为主，这有其特殊的理论背景，并非盲目排外。只是针对日渐加剧的“欧化主义”，章太炎才大声疾呼“用国粹激动种



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究其实际，章氏对向西方求学理这一思潮并不反感，而且自觉投入其中，不只释译日人岸本武能太的《社会学》，东走日本时更“旁览彼上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这使得他在著述中可以不时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乃至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叔本华、尼采、休谟、赫胥黎、斯宾塞等西哲对话与辩难，并以之作为建构理论体系的参照。更何况章氏还有另一手绝活——对印度哲学的了解，使得他能够随意征引婆罗门、胜论、数论各宗乃至《法华》、《华严》、《瑜伽》诸经。这点章太炎非常得意，口述《薊汉微言》时以融会通“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自许。可毋庸讳言，章氏对“东西学人之所说”，谈不上精深研究，好多只是依据第二、三手材料和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一如梁启超《卢梭学案》、《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和鲁迅的《摩罗诗力说》），都是连编带写，近乎纂述，当然也都不无发挥。好在章太炎本就是“依自不依他”，用近乎“六经注我”的态度，借助这些西方学说来构建自家的理论体系。

章太炎之不同于清儒，不只在于他有幸借鉴泰西学说，学术眼界更为广阔；更在于其超越考据，直探义理，成为近代中国真正有思想的大学者。章氏认定学者之病实者（执著滞淹）当施泻，病虚者（浮华夸诞）宜施补，“鄙人夙治汉学，颇亦病实。数年来，以清谈玄理涤荡灵府，今实邪幸已泻尽”（《致宋燕生书》）。诂经精舍七年，章太炎受过严格的朴学训练。由朴学而小学而史学而玄学，此乃章氏治学的大致门径。借用弟子许寿裳的话，就是“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章炳麟》）。倘就追踪玄学丽言，章氏的精神漫游之路大致如下：先是由儒入佛，次则以佛反儒、以佛解庄，最后是儒释道互补。《薊汉微言》中虽有“文孔老庄是为域中四圣，冥会华梵，皆大乘菩萨也”的话，但与传统文人之调和儒释道还是有所不同。就玄理而言，章氏认定中外学说，“无过《楞伽》、《瑜伽》者”，只是“佛法虽高，不应用于政治社会”，这才有待于老庄与文孔（《太炎先生自述学术次

第》)。而儒道相较，又以孔子学说更切于人事，故国势日危时须格外阐扬儒侠，而不可独用佛道。经世求切于人事，求是则不妨高妙。就理论趣味而言，章太炎最欣赏的还是佛学，其著述的思想深度也大大得益于佛学的滋润。

三

古今、中外、儒释道三个层次之间，并非完全隔绝，而是处于互动、对话的状态。这一点，章氏自述学术次第时关于“汉学—科学—法相”三者关系的辨析最能说明问题。分层次只是为了便于把握，有时候根本无法分清孰先孰后。统而言之，章氏之治学，以第三层（哲理与眼光）成就最高，可根基则是第一层（方法与学养）。

在今古文之争、中西学之辨和儒释道的调适过程中，章太炎逐渐形成自己独特而庞杂的思想体系。不过在这有形的三层次的努力中，有一种无形的特殊动力，或者说思维习惯，驱使他为寻求真理而上下求索并取得丰硕成果。这就是其独行侠的气质以及否定性的思维特征。从上世纪末作《明独》，断言“知不独行，不足以树大旅”、“大独，大群之母也”起，章氏一生始终“特立独行”、“狂生”、“名士”、“异端”、“在野党”、“神经病”、“章疯子”、“矜奇立异”、“忤时违众”等等，这就是世人对章氏此一性格特征的褒贬。其中“神经病”的说法，是章太炎 1906 年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供认不讳的：“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章太炎晚年批评世人趋新鹜奇，可“立说好异前人”（包括今人），正是章氏平生活学一大特点，其得失皆系于此。



侯外庐称章太炎研究中“表现出自我横冲的独行孤见，在中国思想史上这样有人格性的创造，实在数不上几人”（《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贺麟在《当代中国哲学》中则断言：“他不但反对传统的中国思想，他同样的反对西方的新思想，其勇于怀疑，与康有为之破除九界、谭嗣同之冲决网罗，有同等甚或更大的思想解放、超出束缚的效力。”萧公权以“抗议”二字作为章氏政治思想的核心（《中国政治思想史》）；河田悌一则干脆称章太炎为“否定的思想家”（《否定的思想家——章炳麟》）。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注意到章氏立论的这一特色。

这种标新立异锐意创新的学术风格，好处是总走在时代前头，善于救弊扶偏，“事未至而先见败征，众人方醉而已独醒”（庞俊《章先生学术述略》），可一味颠倒时论，为否定而否定，虽能出奇制胜，但易失之偏激。

以“独行孤见”、“勇于怀疑”、“抗议”、“否定”为思维特征的章太炎，在清末民初这一场思想文化震荡中，其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一点也不奇怪——这本来就是一个拆散（破坏旧世界）的时代。时过境迁，章太炎许多当年传诵一时的“妙语”与“怪论”，都可能被人遗忘，但其“特立独行”的气势，至今仍令人神往。

1992年1月于京西畅春园

(原刊《文学自由谈》1992年2期)

目 录



代 序 有思想的学问家——关于章太炎 (陈平原) 1

第一章 最近三百年来中国政治和学术的鸟瞰 1

第一节 绪 言 3

第二节 满洲政府的罪恶 8

第三节 民族主义的沦没 12

第四节 帝国主义的猖狂 18

第五节 固有学术的消沉 23

第二章 革命元勋的章先生 27

第六节 幼年期的民族思想 29

第七节 会见国父痛驳康有为时期 33

目
录

1